

ARAB STUDIES

阿拉伯研究论丛

A R A B S T U D I E S

2018年第1期（总第7期）

吴思科 侯宇翔 ○ 主编
李仁龙 ○ 执行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阿拉伯研究论丛

A R A B S T U D I E S

2018年第1期（总第7期）

吴思科 侯宇翔 ◎ 主编

李仁龙 ◎ 执行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研究论丛. 2018年. 第1期: 总第7期 / 吴思科, 侯宇翔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7-5201-4715-6

I. ①阿… II. ①吴… ②侯… III. ①阿拉伯国家—研究 IV. ①K37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7789号

阿拉伯研究论丛 2018年第1期(总第7期)

主 编 / 吴思科 侯宇翔

执行主编 / 李仁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许玉燕

文稿编辑 / 许文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 593665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73千字

版 次 /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715-6

定 价 / 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集人文社科之思 刊专业学术之声

刊 名：阿拉伯研究论丛
主 编：吴思科 侯宇翔
执行主编：李仁龙

ARAB STUDIES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吴思科 侯宇翔

副主任：巩琳萌 戴晓琦

委 员：

周 烈 杨 光 刘振堂 李绍先 马丽蓉 罗 林
王林聪 付志明 丁 隆 肖 凌 刘欣路 魏启荣

编辑部

主编：吴思科 侯宇翔

执行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李仁龙

编审组成员：

李 宁 刘 晖 陈 铮 李小卫 马 伟 张依依
周 思 张 谦 沙娜提·斯拉木 邵晓岩 张琳琳
张丹丹 齐 济 马 涛

2018年第1期

投稿邮箱：arabstudies@163.com

中国集刊网：<http://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http://iedol.ssap.com.cn/>

目 录 Contents

国别和区域聚焦：埃及与沙特的转型之路

- | | |
|---|----------|
| 埃及发展转型的教训与启示 | 田文林 / 3 |
| 艾哈迈德·爱敏“改良”思想之批判继承传统文化 | 李雪婷 / 23 |
| 20 世纪下叶埃及高等教育扩张的原因与影响 | 黄 超 / 35 |
| 《沙特 2030 愿景》和《卡塔尔 2030 国家愿景》的比较分析
——兼谈沙卡断交事件中的战略竞争因素 | 颜小丹 / 50 |

阿拉伯政治、历史与文化

- | | |
|-----------------------------|--------------|
| 约旦穆斯林兄弟会与约旦政权关系分析 | 马晓颖 刘欣路 / 65 |
| 16~19 世纪土耳其帝国对苏丹征服考 | 顾 坚 / 77 |
| 美国应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超冷战考量（1955~1960） | 白云天 / 90 |
| 论阿拉伯固有文化与世界文化多样性 | 程诗婷 / 110 |

阿拉伯语言、文学与教育

中国与摩洛哥高校课程体系互认的设想	马和斌 / 125
近现代阿拉伯语的复兴	鞠舒文 / 137
中阿姓名文化比较研究	李赫男 / 152
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探析阿拉伯小说《杜鹃钟》	游品岚 / 164

国别和区域聚焦：
埃及与沙特的转型之路

埃及发展转型的教训与启示

田文林*

内容提要 多年来,埃及一直谋求富国强兵,但效果不彰。本文认为,埃及“强国梦”破灭主要有三大教训:执政理念从依靠中下层转向依靠中上层,导致民众与政府对立加剧;发展道路从矢志实现工业化转向通过全面开放实现发展,导致埃及重新成为原料生产国;对外战略从“亲阿、反以、疏美”转向“疏阿、和以、亲美”,导致埃及外部生存环境恶化。埃及的教训值得其他国家汲取。

关键词 埃及 阶级基础 发展道路 对外战略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的地区大国,该国从19世纪初就启动现代化进程,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中第一个试图“崛起”的国家(萨米尔·阿明语)。1952年“7·23革命”后,埃及再度引领中东之先,重启富国强兵进程。然而,迄今为止,埃及非但未能成功崛起,反而日趋衰败。目前,埃及8000万人口中,半数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①1960年,埃及人口预期寿命、人均GDP等指标与韩国大体相当,如今埃及人均GDP只有韩国的1/5,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十分普遍。^②2011年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就是该国各种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而且,政权更替数年来,埃及经

*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东政治研究,著有《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走出依附性陷阱:第三世界的发展困境与道路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① Daniel Pipes, "Hunger Grows in Egypt,"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6, 2014.

② "The Arab Spring Has It Failed?" *The Economist*, July, 2013.

济每况愈下,处于该国建国六十多年来最糟糕时期。埃及的境遇在第三世界中颇具典型性,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为其他国家提高治国理政水平提供镜鉴和参考。本文拟从阶级基础、发展道路、对外战略三大方面进行剖析。

一 从“依靠下层”转向“依靠上层”的执政理念转型,导致当权者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政权根基日趋动摇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当权者只有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政权才能稳固持久。历史上,许多国家频频上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共同原因就是当权者日趋背离人民,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乃至政权垮台。当代埃及的兴衰变迁,与其执政理念转变直接相关。整个20世纪,埃及当权者的执政基础大体经历了“依靠上层—依靠下层—再依靠上层”的周期性转换,与这种阶级基础周期性转换相对应,埃及正好经历了“衰落—兴盛—再衰落”的过程。

1952年埃及独立前,法鲁克王朝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当时,埃及的封建地主和资本家,人数不到总人口的0.5%,却垄断了埃及主要的土地、工厂、银行、保险公司、商店,掌握着每年50%以上的国民总收入。在农村地区,不足6%的人口(约16.2万)掌握着全埃及65%的耕地,其中拥有200公顷以上耕地的大地主只占土地所有者总人数的0.1%。2/3以上的地主自己不经营土地,而是以苛刻条件出租给佃户,地租平均为土地纯收入的3/4。^①与之相对应,当时的政权机构以及议会、党派、报纸、法律等,都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的。^②这种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统治模式,极大地抑制了多数民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导致埃及阶级矛盾尖锐,政府软弱无能,只能长期臣服于英国殖民者。

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7·23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① [英]罗伯特·斯蒂文思:《纳赛尔传》,王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86页。

② [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10页。

的斗争。“它是以人民力量为一方，同以垄断资产阶级、大地主和殖民主义等反人民力量为另一方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① 纳赛尔掌权后，明确依靠中下层民众，采取一系列政策提高中下层民众的政治经济地位。一是进行土地改革。埃及在1952年9月9日颁布第一部土地改革法，内容涉及没收法鲁克王室的土地和财产、规定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限定地租最高额度、建立农业合作社等。此后，政府又颁布了几部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修正法案，不断降低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1952年到1981年，埃及小土地占有者（5费丹以下）从260万人增至350万人，增长率为34.6%；同期，其占有的土地面积从210万费丹增至290万费丹，增长率为38.1%。^② 二是改善和提高工人地位。埃及政府出台一系列法律，尽力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如1952年的第317号法令，规定了工人的新权利和待遇；1952年的第318号法令，简化了解决纠纷的手续；1953年的第165号法令，限制资本家集体解雇和迫害工会会员；1955年的第419号法令，规定由厂主出资建立保险基金会；1959年的第91号法令，强调工人间平等。^③ 此外，纳赛尔还取消了法鲁克时期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从组织上削弱和打击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④

纳赛尔本人生活俭朴，两袖清风，去世时个人遗产只有610埃镑。这种执政理念和内外政策，使其深得民众拥戴，即便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民众仍坚定支持纳赛尔继续担任总统；1970年纳赛尔去世时，数百万埃及民众涌上街头为其送葬。因此，这一时期，埃及的政权是非常稳固的。

然而，埃及终未摆脱“政权变色”的宿命。从理论角度看，昔日革命者掌握重权后，可以轻易将社会财富化公为私；当少数特权阶层非法攫取

① [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40页。

② [埃及]穆罕默德·迈哈罗斯·伊斯梅尔：《埃及经济问题》，时事出版社选译，时事出版社，1991，第41~42页。

③ [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03~204页。

④ [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05页。

的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原来清教徒式的革命理念和政策制度,就成为其谋求私利或私利合法化的最大束缚。只有实现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执政基础的颠覆性转向,他们才能放心大胆地攫取和享用这些非法财富,并将其名正言顺地传给子孙。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政权,先天带有很强的摇摆性和易变性。这一阶级不希望保持现状,总是谋求跨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其意识形态总在不断变化。^①一个时期内,它需要获得劳动者支持,因而高喊社会主义口号,采取再分配政策,但它迟早要屈从于个人发财致富的诉求,最终打破与劳动阶层的联盟,成为剥削劳动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②

纳赛尔政权的国家统治精英基本由小资产阶级组成,主张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在政治领域,纳赛尔“将所有的政治反对派统统关入监狱,阻止了这些新兴阶层在政府构成中发挥任何重要作用的可能性”。^③在经济领域,埃及政府曾于1954年1月颁布《合作宪章》,规定实行资本、劳力、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合作,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的各种剥削现象,以及社会主义不能自由发挥作用的影响。^④在土改问题上,埃及满足于“均分土地”的小私有制,而没有继续走集约化、合作化道路。总之,纳赛尔政权试图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保持平衡。^⑤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第三条道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列宁早就说过:“一般小资产阶级,要觉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企图,最后都遭到了破产。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梦想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⑥事实

① Alam Richards &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p.413-414.

② Alam Richards &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410.

③ 《解析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泛起》,第433页。

④ [英]罗伯特·斯蒂文思:《纳赛尔传》,王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第106页。

⑤ Raymond A. Hinnebusch, *Egyptian Politics Under Sadat: The Post-Populist Development of an Authoritarian-Modernizing State*,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88, p.3.

⑥ [俄]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1年3月),载《列宁选集》(第4卷),1965,第517页。

证明，纳赛尔忽略了对大地主、大资本的打击和限制。到最后，在纳赛尔政权周围，右边（大资本）站满了敌人，左边（共产党）却是空的。这使纳赛尔取得的进步成果有限。它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取得成功，但既未能解决阶级不平等问题，也未能实现经济大发展，不能解决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经济危机。这就导致了随之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①

1970 年萨达特上台后，发起“纠偏运动”，逐步抽掉纳赛尔时期“人民性”等进步内容，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措施：归还被没收财产；废除“政治孤立”，让富有家庭回到政权中来；关闭拘留营；让纳赛尔时期因捍卫个人财产和权利被解雇的法官复职；废除政府没收私人财产的权利等。^②1974 年 8 月 9 日，萨达特提出《发展社盟方案》，宣布纳赛尔时期成立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向左、中、右各派开放，等于将其从松散的阶级政党变成了全民党。最后，萨达特干脆解散社盟，在 1978 年成立了“民族民主党”，宣布将奉行“民主社会主义”，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为抑制纳赛尔左翼思潮和政治势力，萨达特转而借重伊斯兰势力。他自称“信仰守护者”和“虔诚总统”，并与穆兄会达成政治交易。需要指出的是，穆兄会看似具有全民性，实则代表的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大地主、大资本力量。穆兄会许多领导人都是百万富翁，主张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工人罢工和农民为保留地权进行斗争。萨达特与穆兄会结盟，等于变相地与大地主、大资本力量结盟。^③

1981 年上台的穆巴拉克基本继承了萨达特的政治路线。政府领导层多数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或法语，与其欧美同行相处融洽，阶级基础也是高度西化的中产群体。^④这一时期，权力与金钱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例如，2004 年成立的艾哈迈德·纳伊夫政府号称“改革政府”，其内阁部长基本由大商人等担任，如埃及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商担任贸

① Deepa Kumar, "Political Islam? A Marxist Analysis," *ISR* Issue 78, July–August, 2011.

② 雷昌伟：《萨达特威权政权与改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6，第 42 页。

③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为反对埃及反帝民主运动，同样借助的是穆兄会的力量。

④ 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47.

易部部长，埃及最大的医疗器材商担任卫生部部长，最大的小麦经销商担任农业部部长。^①

在萨达特—穆巴拉克政府的右倾化政策冲击下，埃及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旧政权贵族、纳赛尔时期的军事—技术官僚精英、开放时期的商业新贵三个特权阶级逐渐融合，成为政府主要执政基础。与此同时，这些特权阶级与资本相互勾结，使埃及“裙带资本主义”盛行。据统计，1975年，埃及约有750名高官既在公有制部门任职，也在私营企业董事会兼职。1976年，埃及最著名的“商人”中，有2人是前总理，22人是前部长，几十人是公有制部门的前主席、副部长、省长。^② 权钱交易使埃及少数权贵在短时间内暴富。据统计，1974年埃及百万富翁只有187人，1975年便达到500人，到1981年又升至1.7万人。也就是说，从1974年实施“开放政策”到1981年萨达特去世的短短7年间，埃及百万富翁的人数增加了近90倍。^③ 一位埃及知识分子将埃及的特权阶层称为“伞兵阶级”，指出伞兵的任务是夺取或摧毁他们所降落的阵地，这个新阶级则是逐步控制或摧毁埃及。^④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两次进行私有化，为少数权贵鲸吞国有财产提供了方便。1992年，埃及接受“华盛顿共识”一揽子方案，启动第一轮私有化，涉及制造业（如纺织厂、棉花公司）、煤矿、公路运输等领域的企业。在此轮私有化中，政府出售了236家国企，获得330亿埃镑，但上述企业实际估值达2700亿埃镑，这意味着约有2370亿埃镑国有资产流失。1996年，埃及又启动第二轮私有化，涉及重要行业甚至公共事业领域，包括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行业，还包括零售、酒店等行业。在这一进程中，国家财富快速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例如，1999年埃及最大的水泥公司以3.73亿美元私有化，但其真正价值至少是该数字的4倍；一家拥有82家连锁店的零售商，被以590万埃镑私有化，但该公司仅门店的土地市值就达

① 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27-128.

② Nazih N. Ayubi, *The Stat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Egypt Since Sadat*, Ithaca Press, 1991, p.14.

③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第378页。

④ [埃及]穆罕默德·海卡尔：《萨达特遇刺记》，发恩、黎启译，柳蓉校，新华出版社，1987，第231页。

400 亿埃镑。到 2008 年，埃及 40% 的财富掌握在 5% 的人手里。埃及股市中最大十家公司的股票市值，约占资本总量的 45%，而这些财富被控制在不到 20 个富豪手中。^① 由此不难理解，埃及腐败问题为何如此严重。根据“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排名，2005 年埃及在 158 个国家中排第 70 位（排名越低，腐败越严重）；2008 年埃及在 180 个国家中排第 115 位，显示埃及腐败日趋加重。^②

“向上看”执政理念的另一恶果，就是埃及中下阶层贫困化加剧，阶级矛盾重新尖锐。20 世纪 50 年代法鲁克国王倒台前，埃及约有 400 万中产阶级（当时总人口约 2100 万），还有 1700 万中低收入阶层。纳赛尔上台后，通过土改、没收财产、增加受教育人数、发展工业等举措，数百万穷人跻身中产阶级行列。但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期间，埃及数百万中产阶级重新返贫。^③ 1970 年之前，埃及贫困率为 30%，但经过萨达特—穆巴拉克改革后，埃及贫困率在 1981 年达到 40%，2007 年增至 48%。^④ 1997 年，埃及产业劳动者月均工资约 250 埃镑（36 美元），但 10 年后（2007 年）反而降到 105 埃镑（约 19 美元）。^⑤ 因劳工生存条件恶化，埃及还被“国际劳工组织”列入黑名单。^⑥ 贫富分化持续加剧，导致埃及阶级矛盾日渐尖锐，穆巴拉克政府摇摇欲坠，最终在 2011 年中东剧变中被推翻。

二 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转行“全面开放”战略，导致埃及“去工业化”加剧，日趋沦为全球产业链下游国家

工业化是现代国家财富的主要源泉。后发国家要想赶超发达国家，必

① 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27-128.

② 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27-128.

③ Tarek Osman, *Egypt on the Brink: From the Rise of Nasser to the Fall of Mubar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52.

④ 戴晓琦：《中产阶级与埃及政局变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⑤ Nadine Abdalla, “Egyptian Labor and the State,” *Middle East Institute*, July 1, 2014.

⑥ 2011 年 6 月埃及从黑名单上被解除。Mona El-Fiqi, “Egypt on the Blacklist,” *Al-Ahram Weekly*, November 6, 2013.

须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实现本国工业化。在西方国家已经占据全球产业链上游位置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盲目实行“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政策，很可能使本国相对弱势的民族工业凋敝，加剧本国财富流失。19世纪以来，正是由于埃及两次在关键时刻放弃“进口替代”，迷信“对外开放”与“自由贸易”信条，其重新成为原料生产国。

埃及第一次尝试工业化比日本和中国还早。早在19世纪初，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就制定、实施了一项旨在实现埃及经济现代化的改革计划。他从西欧各国引进技术，购买设备，聘请专家，使埃及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火药厂、枪炮制造厂、造船厂等，其中亚历山大造船厂生产的战舰丝毫不逊色于欧美各国生产的最新战舰。纺织、造纸、粮食加工等行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到1829年，埃及已建立了近30家棉纺厂，拥有纺织机1459台、织布机1215台。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埃及经济空前繁荣，国库收入直线上升，1798年仅15.8万埃镑，1818年跃升至150.2万埃镑，1842年已接近300万埃镑。^①埃及俨然成为当时的地区强国。

但穆罕默德·阿里的工业化努力，却遭到英国殖民者的强力阻挠。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埃及继续充当原料供应国和产品消费地，不愿意让埃及成为工业国。1839~1841年，英国在埃及与土耳其爆发战争期间，帮助土耳其打击埃及，并在胜利后向埃及提出两个强制性条件：将部队从13万人裁减到1.8万人，导致新办工厂的产品失去大部分市场；在埃及境内实施1838年签订的“英土商务条约”，允许外国商人在埃及境内做买卖，使埃及民族工业直接面临外国工业的竞争。1882~1919年，英国占领埃及期间，十分重视埃及农业，“目的就是使埃及成为一个为英国纺织工业服务的专门生产棉花的国家”。^②英国通过限定埃及专门种植棉花、鼓励外国商人移民、引进欧洲资本、让埃及民族工业凋敝和倒闭等手段，使埃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面的一个农业单位。^③到19世纪70年代，埃及工业

① 潘光：《穆罕默德·阿里：埃及改革开放的先驱》，《解放日报》2013年3月27日。

② [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07页。

③ [埃及]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75~76页。